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吕文浩
编

费孝通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吕文浩
编

费孝通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费孝通卷/吕文浩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747-6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费孝通 (1910~2005)-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4075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费孝通卷

吕文浩 编

Fei Xiaoto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0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9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 19 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 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前言：重视从思想家的角度研究费孝通

像费孝通这样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曾经见证并在晚年实际推动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人物，理应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和解析，才能充分地将其思想遗产和人格魅力清晰地呈现出来。从既往论著来看，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者多着眼于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表现，成果比较集中；在历史学界，自 1981 年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出版《费孝通传》^① 以来，以费孝通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深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将两种类型的成果有机地整合起来的研究就更少了。

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发表的研究费孝通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思想的长篇论文。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对近代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者的看法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在历史的脉络里梳理费孝通关于农村经济主要问题的见解，并将其思想特色及价值加以解析。根据他的研究，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几乎涉猎了农村经济的各个主要部分，包括人地关系、土地分配、租佃关系、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不仅如此，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并非孤立论证，也不是单从经济论经济，而是多从侧面开掘，又是相互联系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构造的互相牵扯，但也与费孝通微观

^① 中译本 1985 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2006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

而全面的社区调查以及宽阔的视野有极大关系”^①。他对于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全面性、独到性、辩证思维以及前瞻性等特征都结合具体问题加以阐述，对于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教授的这些梳理和分析，我都是同意的。不过，对于他关于费孝通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我则有不同的理解。也许是出于对于费孝通的更高期许没有得到实现的遗憾，他认为费孝通没有在农村经济领域提出像他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差序格局”“社会继替”那样高度抽象的概念，致使他在世界小农经济学派中没有应有的地位，不能与俄国的恰亚诺夫、美国的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相提并论。在我眼里，费孝通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其次才是一个李教授概括的“社会经济学家”，他论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始终将其置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框架之下；而且他有很深的经世情怀，对于当时局面日益严重的农村经济问题急于给出可以付诸实践的政策性建议，并没有从容的时间来提炼理论概念。^②从学理上来说，他不具备在农村经济领域提出高度抽象概念的知识储备和长期的深入钻研；从心态上说，这也许并不是他当时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声明自己并不是个农村经济学的“专家”，“只是因为接触了中国农民生活而引起的一些常识性的分析”^③。

介绍和讨论李金铮教授的这篇近作，我想说明的是，将费孝通视为思想家，揭示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特色在目前还是一个有极大开拓空间的学术领域；但是，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忽视费孝通本人的学术背景和治学宗旨，否则就容易对前人提出不切实际的期望。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费孝通的主要贡献是：从农村经济角

① 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载《近代史研究》，2014（4）。

② 费孝通曾坦承，《乡土重建》一书从研究步骤上来说应该属于在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比较成熟之后才能着手做的工作，他在《乡土中国》和在《观察》周刊上发表的“从社会结构看中国”这一步的工作还没有能够整理出一个系统时就迫不及待地着手做下一步的工作，“总不免有一点乱了步骤”。详见费孝通：《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收入《乡土重建》一书，见《费孝通文集》，第4卷，418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不等思想成熟了再从容地发表意见，我想与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现实的乡土社会重建问题应有密切关系。

③ 费孝通：《内地的农村·序》，见《费孝通文集》，第4卷，183页。

度切入，对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民生计问题、工业化转型问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思想主张^①；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他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识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对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改良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并重的平民政治理想；他在对美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初步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晚年“文化自觉”学说的雏形。在上述这些方面，他花费精力最多，论述最为充分的是乡村工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论概括虽然论述不多，但角度新颖，影响深远；提出平民政治理想以及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文化分析的初步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费孝通社会思想的完整性。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看，一个充满中国情怀但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中国情怀的社会思想家的形象会跃然纸上。

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从农村经济入手，其主要著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以农村经济为核心议题，对于当时农村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所涉猎，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但是他的着眼点却不在农村经济本身，他关注的是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为此，他对乡村工业的现实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对城乡关系中重要的社会阶层——地主、士绅在转型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如何吸收英美政治中注重平民政治的新动向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抱有美好的希望。费孝通对乡土中国尤其是经济问题用力颇深，成果卓著，但他的目标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光并未局限于农村本身，而是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之所以倾注了很多精力，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还是农民，国民经济的主要来源还要依赖于土地上的收入，要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不对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问题下一番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不行

①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被广泛引用的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黄山书社，2008）一书，对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代表性论述选录的很少；近期池子华教授在《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与应对方略：路径探索与现实关怀》（收入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一文论述农村工业化道路代表人物时未列费孝通，仅片段地引证了他的少量论述。

的；另外，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最为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农村经济出现重重危机。但是，农村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农村本身来解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农村之外的社会势力的协助，政治上的变革尤其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思想家的角度来研究费孝通，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课题，本文只是借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费孝通卷》“导言”之机，为这一课题勾勒一下轮廓而已，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学术界同仁的继续努力。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工业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以及外国工业产品的流行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原有的手工业逐渐趋于衰微，原来依靠农工搭配来维持收支平衡的农村经济面临极大的危机，离地地主在城镇里大多没有从事生产性的活动，而是依靠田租这根“麦管”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吸血，使本来比较缓和的租佃关系趋于紧张乃至激化。“农村破产”的呼声此起彼伏，而地主士绅阶层能否放弃寄生生活，成功地转向生产性的现代工商业，是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从费孝通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的家族属于生活在城镇的没落的地主士绅阶层，本来对于民间的疾苦并未有直接的、切身的体会。最初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农村经济实际现状的是他的姐姐费达生。费达生于1922年从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在日本进修蚕丝改良，为时一年，回国后她和蚕校的几十名同仁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以“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①深入农村，投入到蚕丝改良的艰苦工作中去。姐弟情深，在母亲早逝之后显得愈发真切。在姐姐的引导下，费孝通对于以蚕丝改良为核心的农村建设工作在技术上、组织上的种种情形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他甚至在1933年和1934年两度帮助姐姐代笔，以其名义发表文章论述蚕丝改良的经验。^②1936年初夏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为其拟的学名是“江村”）养伤，顺便实地考察丝厂

① 费达生：《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载《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此文为费孝通代笔，同时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

② 费孝通为费达生代笔的另一篇文章是《复兴丝业的先声》，载《农村经济》第1卷第9期，1934年7月1日，亦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

的情况，住下后很快被现代缫丝工业进入农村的情形吸引住了，便对开弦弓村做了将近两个月的社会调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调查材料成为日后其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基础。费孝通进入开弦弓村没有语言和文化习俗上的障碍，加上姐姐负责蚕丝业改革带来的全村人的信任感，都使得费孝通的调查活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而且有“我以前曾多次访问过该村，姐姐也继续不断地向我提供该村的情况”^①的持续支持，所以尽管田野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开弦弓村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开弦弓村成为费孝通了解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窗口，对于他形成自己独特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开弦弓村，费孝通亲眼目睹了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落败之后农村经济的萧条局面——农民日益贫困、高利贷横行、土地权加速流入到离地地主的手里等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他认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②，因为以农村手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迅速衰亡，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

在开弦弓村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道路。1938年秋从英国回到昆明后不久，他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站（因避空袭而搬迁到呈贡县魁星阁，故简称工作站为魁阁）所亲自从事或主持的许多研究计划都是对开弦弓村经验的进一步延伸。在禄村研究中，他着重考察现代工商业发达前期农田经营方式和土地权的流动问题；他指导张之毅实地研究了易村的手工业与玉村的农业和商业；他还指导了史国衡和田汝康对于昆明工厂男女工人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为他探讨乡村工业问题以及现代工厂组织中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劳工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一样，费孝通常常借着给学生著作写序的机会总结研究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为张之毅著《易村手工业》写的长篇序言《中国乡村工业》，为史国衡著《昆厂劳工》（附田汝康《内地女工》）写的长篇序言《〈昆厂劳工〉书后》，都是这样的例子。《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是费孝通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探讨中国乡村工业性质及其可能贡献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国农村中并不只是农业一枝独秀，而是农工混合，工业帮助农业养活了庞大的乡村人口，所谓传统工业，主要包括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他希望在现代工业开始分散的新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见《费孝通文集》，第2卷，2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201页。

趋势下，在技术上借助于电力和内燃机，在组织上采取合作方式，使乡村工业所获得的利益分散到农民手中，帮助他们解决生计保障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消除借贷和土地权流失的问题。在《〈昆厂劳工〉书后》一文里，费孝通则以具体实例详细地展示了其业师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如何提出理论假设，又如何在地调查中修改理论假设。在研究中他和史国衡都特别注意到劳心者与劳力者分工的传统社会结构如何复制在现代的工厂中，使职员和工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分野，从而影响现代工业的劳力基础。这一发现在《劳工的社会地位》等文中有比较充分的发挥。

《〈昆厂劳工〉书后》一文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法国社会学家勒普莱和涂尔干关于工业文明破坏社区生活完整性并导致社会解组的论述，这种现象在昆明的工厂组织里也有其表现形式。费孝通在昆厂劳工研究的基础上，提示讨论中国工业建设者应注意协调工业文明和个人人格的完整性，但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1945年冬的一天，费孝通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青年教员袁方在昆明的一家小茶馆里闲谈，因袁方要到成都去开手工业讨论会，两人便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手工业的话。后来张之毅、张莘群也加入这一话题的谈话，谈完后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业讨论会上宣读。四位作者之中，费孝通、张之毅曾对农村手工业实地调查研究过，袁方曾研究过昆明的手工业，对于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都有深切的认识，又时时听说手工业绝对没有前途，必将被都市大工业所取代的言论。这篇文章颇有针对性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们关于手工业前途的见解。后来这篇文章作为时代评论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以费孝通拟的书名《人性和机器》出版。1946年小册子又在生活书店再版了一次，所以在学术界、思想界颇有流传。以“人性和机器”为题，显然是接着《〈昆厂劳工〉书后》一文提出的理论命题而来的。

在以费孝通为核心的四位作者眼里，当时以手工业为主的中国乡村工业不仅在技术上、组织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暗合了西方工业分散化的最新趋势；不仅如此，它还避免了将人性与机器割裂开来的工业文明之弊，完美地将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写道：“社会机构不像机器可以过了洋不变质。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长出来。利用机器生产固然会影响社会机构

的方式，但绝不会只限制于一种社会方式。目前利用机器生产的国家就有不同的社会方式可以作证。我们可以输入机器，可是也许绝不能输入社会方式，社会方式是要自己创造的，要在人民的习惯中生根，要能配合其他各种社会制度。我们主张在旧的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中去吸收西洋机器生产，目的就在创造一个非但切实，而且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① 这种着意于“从传统中求了解，求批评，求改造”^②，寻求中国特色经济建设路径的思想原则，在他们看来，具有超出经济建设范围之外的广泛适用性，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也未尝不可以遵循。从《人性和机器》的立意来看，费孝通对于乡村工业的解决方案不仅具有政策上的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人性和机器》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批评来自社会学家吴景超。他的商榷性文章《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于1947年发表在《经济评论》第1卷第20期上。^③ 他着重就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1）费孝通等没有将农村手工业和农村工业分清，前者是利用有生力量，后者是利用无生力量，前者一定是趋于衰微的，后者才具有发展前景；（2）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的确可以将一部分工业分散到农村中去，而且希望工业下乡以后，近代文明也连带下乡，给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民带来“一种更有趣的生活，更丰富的享受”，城市社会生活并不像费孝通等描述的那样灰暗；（3）机器工业的兴起固然会引起手工业的崩溃，但并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不久，费孝通发表《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在答复中，费孝通对于农村手工业趋向衰微，而且在技术上需要提高到机器工业是承认的，其解释基本是重复1941年撰写《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时的观点。他还认为，不能抽象地讨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的短长，他所着眼的是如何在近期复兴工业，而不是吴景超更看重的在两三代中国人手里都无法完成的都市工业化，在他看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目标的乡村工业是一条可行之路。对于机器文明和人性的冲突，费孝通基本上重复了西方社会学家的论述，希望在“手艺精神的再生”中将乡村工业作为促进社区生活完整的力量。他并没有直接回

① 费孝通等：《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见《费孝通文集》，第3卷，393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② 同上书，387页。

③ 收入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10）下编“相关研究补编”。

应吴景超对于城市生活更自由、更丰富的观点，只是说这种批评是不公允的。

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很大一部分篇幅实际上还是在讨论乡村工业的问题。像《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形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节约储蓄的保证》这些篇目，在基本思想上与之前的论述完全一致，所增加的主要是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而已，所以我在本书中只选了第一篇，对这个问题本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其余的篇目。《侵蚀冲洗下的乡土》《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地主阶层面临考验》等文则是比较多地谈到了乡村工业重建过程中地主士绅阶层面临的考验，以及新式知识分子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我们知道，费孝通本人与地主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品味爱好以及当时面临的社会困境，他是非常熟悉的，在《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一文里，他甚至还引用了家乡一位地主给他的私人信函的内容。他尽管对于地主士绅有相当温情的理解，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拖着一大半身子在传统趣味里不能自拔的阶层的局限性，他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放弃从土地上吸收田租的寄生生活并转向生产性的事业。当时有人批评费孝通是想以资本特权来代替土地特权，放弃农业夺取工业，为地主阶层做“谋臣策士”。费孝通并不完全否认这种批评，他的正面说法是，他并不想在维持特权的前提下为地主阶层作打算，而是想为这个阶层求一条合理的出路，即“我确是认为只有‘放弃农业，开拓（不是夺取）工业’才是现有地主阶层应当采取的道路，但是同时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把他们这阶层的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①。乡土社会一批一批地把子弟送到城市接受新知识，但这些接触了新知识的子弟却没有回去为乡土社会服务，完成社会的有机循环，费孝通将这个社会过程称作社会性的侵蚀作用，就好比土地在自然界经受的侵蚀一样。也许在他心目中，像姐姐费达生这种抱着宗教般热忱的下乡知识分子，像他在英国看到的那些热心为地方做公共服务的退休士绅，才是未来乡土社会的希望，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将新知识带给乡土社会，促进其实现现代转型。但问题是这样少的知识分子足够建设乡土社会吗？热心于城市化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早在20世

①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收入《乡土重建》一书，见《费孝通文集》，第4卷，380页。